

盟邦人士

的靜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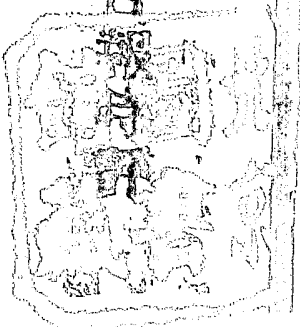
國際輿論第一輯

目次

盟邦人士的諍言	解放日報時評	一
遼東的混亂	美國新共和國雜誌	五
新中國的近况	格爾德	七
在延安設美領事館	大美晚報紐約版	一〇
到陝甘寧邊區建立空軍基地	史蒂華	一一
煩惱的中國	愛金生	一五
論中國形勢	史溫格	一七
中國軍隊的實情	I·K·羅辛格	二〇
中國的通貨膨脹	塞伐萊特	二二
中國的內爭	紐約時報	二五
中國近况	美國時報週刊	二六
中國內部的危機	F·V·費爾特	二八
英國工人日報重新主張國共合作乃戰勝日本的關鍵	美亞誌雜	三六
中國爲民主而奮鬥和目前的政治危機		三七
紅星報評論家論中國戰局		五一
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分析中國形勢		五二
報評論中國處境嚴重援華委員關心通貨膨脹		五三

盟邦人士的語言

解放日報



近年來國民黨當局對「國際宣傳」的方針，不外兩端：一是粉飾太平，掩蓋當局消極抗戰，志圖獨裁的英國政策；二是借鑒制論，封鎖全國人民要求加強團結抗戰，實行民主政治的呼聲，而對於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八千萬人民的抗戰業績與偉大建樹，則更顯其認識的能事，可是不管國民黨統治人在這方面多麼努力，而英美等國及法西斯人士的越鏡目光，仍從透過重重封鎖，擷取抗戰中國國情，造成了促進中國團結民主的有力的國際輿論。這種國民黨當局所感到的「國際宣傳」的危險，最近透過國際電檢查而到達此間的英美報章雜誌上所登載的討論中國問題的文章，已在本報陸續發表，且更明確地證實了這一個事實。

國民黨統治人士不是不斷地認頌八路軍新四軍為「游而不擊」、「襲擊國軍」嗎？可是英美輿論界的見解，却與此完全相反：美國無線電新聞評論家吉溫氏認為八路軍「堅決有效的抗日」。英國新聞記者羅德氏說：「共產黨的軍隊比國民黨管轄下的大部份軍隊效率高」。紐約特報雜誌指出：共產黨人「在許多方面，比中央政府抗日更為積極，他們的游擊隊更為有效」。美國新聞雜誌雜誌報導：「新從中國回來的觀察家，認為共產黨在目前抗戰中，所做的事情却比重慶政府為多」。他們對於國民黨又作怎樣的求呢？紐約德氏對國民黨當局對於日本「只有無法避免的時機才打一下」。美國政府及其軍隊雖然擁有許多的物資，絕對抗鬥等却不解一般預料的準備。國軍的游擊隊進行，國民黨的游擊隊的五十萬大軍被用在封鎖共產黨。紐約時報也指出：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似乎比打日本尤為關切，其「對日作戰實際已經停滯」。並指責「國民黨軍隊對敵的游擊隊的游擊隊為其次的「浪費」。由此可見，英美輿論界已日益明白負負抗戰大部重組的「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所所謂「游而不擊」。而「襲擊國軍」等等輕視之詞，適足為證據者自己為照而已。

573.07
300-37

「國民政府」與「我國的援助」。只要是有中央政府之名。不管怎樣反對人民。英美盟邦那裏有不給過支持之？其實，國民黨統治人士這種想法也是非主觀的。如其不信，請再看一看英美盟邦的輿論吧。紐約時報曾有這樣的報導：「史迪威將軍以監督租借法案供應品給中國的地位。設法保證這些器械不被中央用來反對共產黨。」美國雜誌也謂：美國人「怕給與中國政府的軍事設備供應品會用來打內戰」。英國的格爾德直率地提出了：「同盟國現在所援助的最英勇的中國士兵還是國民政府內法西斯主義者」的問題。很明顯的，英美盟邦的援助，是爲了打敗日本法西斯，而決不是爲了助長中國反動勢力的氣餒。如果國民黨統治人士甘於落後倒懸。而欲僅僅藉中央政府的地位，來維繫盟國的信任，這也是不可能的。英美法法西斯人士由於日益了解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成績和民主建國，已經認識到保證他們得到一部份的英美物資援助，是打發日寇的有效辦法，也是對日反攻的必不可少的一步。如費爾特氏主張：「用給一切真正抗日份子以同樣的援助來幫助中國的民主政治」。史都華氏主張：盟國空軍利用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爲轟炸日寇據點的基地，並主張以「租借法案的軍需品，供應到華北的大部份地區，使當地游擊指揮部轉入反攻，以嚴重地困擾日本佔領軍」。新共和雜誌則向中國政府建議：「共產黨應該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武器，裝備起來，參加到抗日的總戰略中來。」可見盟國人士，對於援華供應品的分配使用，具有一定的要求。這個要求，一方面是保證抗戰有力的八路軍新四軍獲得必要的接濟。盟國人士這種要求，合於我國的抗戰利益和同盟國反法西斯事業的共同利益，對於這樣正義的要求，國民政府當無任何拒絕的理由。只會伸手向人家要餉要械，而對於人家的正確意見置若罔聞，這種作法，應當迅速放棄。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盟邦有識人士的諍言，充滿着休戚相關的戰友之誼，他們對我國人民在抗戰中所表現的偉大品質，無時無地不表露無限的崇敬，同時對於我國當局的錯誤政策，則不惜苦口婆心作嚴正的批評，並誠懇地勸告他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必要的改革，以加強我國國內的團結和我國與他盟國間的合作。盟邦人士這種精神，等和同盟國家民主合作的原則完全符合的，它

和中國人民的民主團結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我們深望國與黨領袖人士爲中國抗戰前途計，爲聯合國家共同事業計，爲自身利害計，對於阻撓人士的謬言，立即放棄深明洞鑒。文過飾非的辦法，而毅然決然採取虛心反省、改過遷善的態度。

遠東的混亂

美國新共和國雜誌

（譯自美國新共和國雜誌，本年三月十三日出版）

遠東的「大問題」，就是重慶的中國政府，不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的力量與一般重慶的問題。據傳在開羅會議時，羅斯福先生和邱吉爾先生告訴蔣委員長，在重慶政府與中共成立諒解以前，不能重開滇緬路，也不能使中國在軍事上強起來。

中國的一般情形是頗為暗淡的，粉飾太平，對盟國事業並無好處。當日本佔領了沿海的地帶後，國民黨喪失了大部份中產階級的支持（包括在西方國家所稱為自由民主主義者的大多數），國民黨投奔到內地的地主方面了。政府已為無效能及腐化所侵蝕，而這樣更增加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避免的由飢荒而損失的大批人命。而更為重要的事實，是中央政府在目前對打共產黨似乎比打日本更為關切。雖然對日作戰實際上已停滯，重慶數十萬最精銳部隊却浪費在西北共產黨統治的約有五百萬人民的區域的邊緣上。有些新近從中國歸來的美國觀察者，認為中國共產黨雖只有有限的資源，但在目前就自戰爭中所做的惡劣却比重慶政府為多。

這是不幸的情況。而美國的政策，很遺憾地也許在使它更為惡化。大概我們的政府，覺得它只能重新調了的中國政府來往，我們一切援助都是限制於給重慶政府。但不幸在政治的真空管裏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在中國，一般都認為無論重慶政府怎樣的貪污，辦事不力，反動，美國是永遠支持它的。這樣，至少有兩個壞結果：它使重慶政府覺得不必力求上進；疏遠了中國許多最優秀的人，那些人認為目前的政府在任何方面都不上孫中山先生的合法繼承人的。

要記得，中國共產黨並不是在莫斯科的影響之下，他們是有能力採取完全獨立的路綫的，他們主要的目的在消滅地主制度和推行教育及工業化。

同盟國家對南斯拉夫的政策，很可以作為中國的先例。在南國，一罷滯了鐵托是在打德國，而米
德洛維區不然後，我們馬上丟下米海洛維區，而援助鐵托。明顯地，我們不應丟下蔣委員長，但是我
們很可以向他這樣說：我們主要的事情是在趕快地取得戰爭的勝利，爲達到此目的，需要每一個健壯
的士兵上戰場，而那些監視共產黨的部隊，應立即開始打日本，共產黨應該得到他們所需的武器裝備
等，都參加到抗日的總戰略中來。

無疑地，蔣委員長會回答說：共產黨想奪取政權，在擊敗日本之後，他們將發動內戰，因此把政
權交給他們作爲此用會係蠢事。但是回答是：共產黨又是在未審前判罪了，如果中國不是一黨專政的
國家，像蔣介石最近所策劃的一樣，那麼共產黨爲什麼又不該成爲左翼黨？像戰前歐洲的那些共產黨
一樣，有代表參加到聯合政府裏面呢？只有如專制國家內，共產黨才成爲威脅，那裏絕大多數人的命
運是十二分的貧困。只要中國向民主主義的方向前進，共產黨和重慶之間的矛盾是可以緩和的。

新中國的近況

格爾格

（作者為英國新聞記者駐重慶記者。本文發表於英國《泰晤士報》，蘇聯真理報會子轉載）

重慶的自由主義份子正在失勢，外交部長宋子文已經失掉了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地位，這個職位由財政部長孔祥熙接任了，宋子文將失掉處理租借物資的中國軍閥的主持人的地位，甚至可能會離開外交部。

在軍事方面，和中國共產黨人成立協定的主要障礙之一是財政部長何應欽，他穩穩地坐在馬上，他如何應欽得到示意，他很快就會進攻共產黨的。只有委員長才能這樣示意何應欽，但是委員長知道這樣的步驟不僅會威脅他在各省的統治，而且會激怒軍事上直接幫助他的美國人。

說句公道話，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雖然擁有的許多的物資，但對抗日鬥爭却不如一般人預料的那麼積極而有效地進行，如果國民黨的三百萬大軍在目標上和戰略上和東北共產黨軍隊聯合起來，那就會使在中國的四十萬日本軍隊無法可施。但是國民黨的訓練最好，配備最好，給養最充實的五十萬大軍，僅僅用來封鎖共產黨。

在此間外國記者在記者招待會上問起封鎖共產黨的問題，重慶否認有封鎖存在，而據告訴記者說。他們在出關於共產黨人的消息，必須不違犯中國利益。在這次招待會之後，我和英美記者去訪問國共參政員共產黨員董必武，他和政府說的相反，董必武肯定的說：「封鎖是存在的，我們現在自己的報紙上發表通訊稿，檢查員一個也不讓通過。」董必武的揭發之中有些什麼點呢？他的話歸納起來，主要如下：「假如蔣介石的行爲合乎三民主義，給小黨派以合法的地位，改變其對於共產黨軍隊的態度，撤銷封鎖，並保證以供應品輸給這些軍隊，共產黨人在今天和今後一定擁護蔣介石。」他宣佈



。「共產黨軍隊三年以來，沒有收到過供糧品或錢。」不僅如此，他說：「國民黨只在三民主義之基礎上進行一個主義——民族主義，而共產黨正相反，由於保護言論和集會的自由，實踐着民權主義。他們應該法實行民生主義，並按照此主義，人人須得到若干最低生活程度的保證。」

一句證據使我們相信共產黨總行政是中國最好的，共產黨的軍隊比國民黨管制下的大部份軍隊效率高。自然他們是不願接受軍政部長何應欽所挑選出來的無效率的軍官們去統治他們的軍隊的。因為國民黨分配軍事職位並不根據軍事上的功績，這是英國人十分明白了的，那決定因素只是政治上的考慮。

美國人竭盡一切力量和助戰作鬥爭，他們建立了軍事學校，而且保證最好的物資從印度買很大的危險運到中國，但使保證中國派人到這學校裏去住，並將訓練好的人員用到正當的用途上，那是很困難的事。訓練期一滿，受訓人員就馬上歸中國統帥處理，美國人只能由談話勸告上發生影響。

在中國最好的部隊是美國第十四航空隊所屬的中美聯合大隊，這是中國最優秀的人，過去曾在美國學校裏學習，現在駕駛美國的飛機，是在陳納德將軍直接指揮之下的。這說明了凡戰略和軍隊的行動在不受國民黨政治影響的地方能成功的是什麼。陳納德將軍認為照他這樣努力，可能在中國最迅速地取得勝利，因為沒有理由期望中國人在今後數年間開始嚴重的戰鬥。當然局面或者會發生突然變化，但可能很少。打仗只有無法避免的時候才打一下，常備之戰是在付了極大損失代價之後才敢打的。但是特別有意義的事實，是這次戰役和開羅會議同時進行，其時不得不「保持他的威信」。

中國士兵顯示着無與倫比的膽量和忍耐力，許多年以來他們在飢餓和傷亡之中瀕於死亡。但是仍繼續戰鬥，因為他們恨日本人甚至比恨他們自己的資本家和地主更厲害。這些英勇的人應該得到我們所能給的一切援助。然而同盟國現在所援助的是他們呢，還是國民黨法西斯主義者呢？如舉重慶目前的反自由主義傾向繼續下去，中國打敗日本後，很可能出現像法西斯獨裁的東西，用租借法案的錢來壓迫民眾，推行他的一切企圖，那時中國再也不存在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了，沒有人有權發表和政府路線不同的意見。

在中國這民主政府人員中，有許多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兒女，但他們被壓迫在沉默中痛苦，因為他們要將生命與財產都獻給抗戰，而他們所希望的是能將他們的苦悶與憂慮，向社會大眾發表，但他們現在也保持沉默，這是不對的，他們應該向全國同胞發表，這真是痛苦在苦悶中呻吟的兒女。

直到今天為止，我還沒有看到任何報紙對自己的錯誤，可是這報紙卻受到最嚴厲的檢查。這不難使人想到政府之允許這種報紙出版，是在政府可能好向外國的批評者們宣佈：當我們准許我們修改之後，他們自己報紙的時候，你們說我們應該他們的理由，在這種的兩個外國人對中國人民的耐心，甚至到他們的忍受力不得不十分佩服。如果中國人把同盟國的援助作適當的用途，他們是有要求更多援助的資格，而真正的自由而民主的中國，會是極大的極好援助的力量，而法西斯的中國，就會變成像日本一樣地危險的國家。

在延安設美領事館

大美晚報紐約版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大美晚報紐約版)

中國共產黨人早在西安事變以前就催促抵抗日本，並因為這些，中國共產黨人同中國其他的部隊
能肩作戰這樣長久，以反對日本的奴役；也正因為他們介紹了各種改革給他們的邊區政府，所以他們
在中國人民中的羣衆基礎在繼續擴大，他們獲得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和權威，這重要性和權威遠過於他
們的人數與區域。

他們的存在，使中國政府遇到一個嚴重的內部問題。但是情形的惡化的可能，其影響會遠遠越出一
個國家的邊疆，會不會一個中國的內戰最後把我們帶入第三次世界大戰，好像西班牙內戰揭開了這
次歐洲方面大戰一樣呢？

我們必須知道關於共產黨、關於握有這樣樞紐性的地位的區域和軍隊的一些情形，我們得不到許
多最簡單的情報，那對有條理的解答是必需的。我們政府機關所委派的人沒有人曾經去拜訪過延安中
國共產黨的總部，甚至旅行經過邊區的都沒有。

神祕和遙遠把這個區域從中國的其他地方蒙蔽起來，這使中國的朋友們會失去了這種時機，讓
得各處的敵人的特務。假如中國政府允許我們政府派一個美國領事館從延安出發到延安去，這個國家的
問題早已解決了。

從大處着眼，這樣的步驟將對中國政府本身是莫大的利益。這樣中國政府可以把他制止內戰的願望
顯示給其人民，藉藉美國人民表示其親善我們之間的友誼。

不論美國在滿洲的領事館已經重新設廠，最近在桂林、西貢、地底我設立了領事館，那裏的中國
政府提議同時在延安設立領事館的要求不是一個被遺棄的政治家的提案嗎？

到陝甘寧邊區建立軍事基地

勝利須在中國爭取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民衆日報）

太平洋戰爭中盟國兩度來戰時，最後由於盟國的勝利，以及盟國高技術的援助而得勝。這就足以證明盟國全力的合作，最後必能取得太平洋的勝利。盟國必須在中國爭取最後的勝利。

安諾德將軍觀察最近克拉克將軍與馬尼拉島的談話，他說：「他認為『唯有從中國的勝利中，盟國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他認為盟國在中國爭取最後的勝利，是盟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主要目的。他認為盟國在中國爭取最後的勝利，是盟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主要目的。他認為盟國在中國爭取最後的勝利，是盟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主要目的。

安諾德將軍的聲明是意味深長的，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中國僅僅只是太平洋戰爭中的次要的戰場。美國大部份人認爲中國的潛在的重要性及其在事實上所擔任的角色的距離，是令人不解的。盟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勝利，是盟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主要目的。他認為盟國在中國爭取最後的勝利，是盟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主要目的。

充分利用中國作基地的意義是深遠的，自然甚至於未獲解決的俄國問題。現在一般人都已認爲盟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勝利，是盟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主要目的。他認為盟國在中國爭取最後的勝利，是盟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主要目的。



第一、在國內建立外國的駐軍部隊。主眼是空軍。

第二、在中國國內建立外國的駐軍部隊。主眼是空軍。

第三、在最後反攻時逐日寇出中國，中國需要能進攻現在滿洲的軍隊。有些軍隊是有訓練的，而且對滿洲有經驗。但是他們要由防禦進到反攻，就需更換新的訓練。有些是滿洲的內部的政治而保存着的中央軍中。第四、在最後反攻時逐日寇出中國，中國需要能進攻現在滿洲的軍隊。有些軍隊是有訓練的，而且對滿洲有經驗。但是他們要由防禦進到反攻，就需更換新的訓練。有些是滿洲的內部的政治而保存着的中央軍中。

但是，在對日本反攻之前，一定得先在中國建立強大的空軍。中國戰場的軍事基地，可以建立在蘇聯。日本空軍工業中心的航程內。這一事實，更增加了創立空軍的必要，這已經在開始計劃進行了。在中國，今天美國的山西航空隊漸漸地伸展其作戰的範圍，不論在戰術上支持中國空軍方面，以及在戰略上轟炸敵區以及供應轉方面。可是目前第十四航空隊的基地，局限於揚子江以南的地區，它的戰略轟炸的範圍，包括湖北及越南。泰國的大部份，海南島、香港與台灣，雖然範圍頗廣，在最高戰術的效果上仍然是太偏僻了。第十四航空隊的基地，只有台灣有些重要一點的工業設備，基本的飛機遠在北方——日本、朝鮮和東北，如果集中的轟炸要炸到日本帝國的內圍，則華北空軍基地是十分必要的。假如：從山東的膠濟半島某些部分，或者是揚子江入海處北部的沿海地帶，極距離的轟炸機可以襲擊大部份的日本工業中心地帶。



八路軍的部隊及共助的海陸隊，佔領了山東內地的很多地區，其中包括山東東部的膠濟半島。國軍正在揚子江河口以北的魯北濱海區作戰，這些事實，並非示意第十回航空隊馬上就可在那些地區建立空軍基地。空軍根據地，必須有安全的出入口和供應路線，而且一定更有能够抵禦大規模襲擊的陸軍防守。但是，華北共產黨所據守的廣大的地區，應該在推進對日本經濟中心的空戰中，予以充分的利用，在考慮這一方面可能性的時候，必須明白華北軍事和行政的一般狀況：黃河河曲以東直到濟海的整個區域，像鐵路一樣地密佈着游擊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安坐在日本據守的主要鐵路與河流交通綫之間。從黃河到海邊之間，五個主要的游擊隊的行政機關統治着綏遠、察哈爾、山西、河北、河南省東部和江蘇的廣大的地區，這些游擊區的居民的確實的數目不得而知，但估計大概在三千萬到四千萬之間。

游擊隊的總根據地，是在黃河西南的邊區，其首府是陝西的延安。邊區包括陝甘二十多縣，國民約二百萬，十八集團軍總部的主要的教育機關及訓練學校，醫藥中心的中部，以及中共主要的職工領袖都在那裏。邊區沒有被其宣傳，共產黨的「正規的前鋒」延伸在黃河海曲沿岸，即邊區的東部邊境。

我們已經談過邊區或黃河游擊隊在進攻時，在華北必須以建立空軍基地，那是在這基礎上。我們立刻可能做的是什麼呢？邊區對日本的情人是安全的防衛力的，在開始空襲日本的內陸方面，邊區佔有戰略的地位。從該區中移地出發，華北的大部份是在空軍的有效轟炸範圍之內，可以襲擊煤礦、焦炭的主要部份的開採煤礦的主要設備，同樣是可以襲擊運輸大量煤、鐵砂、棉花、鹽、五穀、天津海岸以及日本北部海港的紅綠燈的鐵塔。如果這兩個條件實現了的話，飛艇在邊區建立空軍基地應該是可能的，這二個條件乃是：十四航空隊要積集充分的供應品，以及開放對邊區的封鎖。

在邊區建立了空軍基地之後，就應當向沿海推進，經過山西、河北、山東，在那些省份中增設空軍。在最後的分析中，這方面的軍事問題，只是使該地區陸軍足以防守那些空軍基地，而已在華北



有作戰的聯繫隊的有效性。減少了這一任務的困難。在選擇空軍基地的關鍵區域。供給游擊隊以三營步兵。機關槍及輕山砲。就能迅速擊退有充分的防守力。如將滿洲的軍需品。如能供應到華北的大部區域。可以使當地游擊指揮部方面輸入反攻。以嚴重地困擾日本佔領軍。但是這樣的辦法。一定得等到封鎖問題解決以後才行。

在開羅會議上說。似乎曾提出過必須解決中國內部的某些政治問題。作為對日全面反攻的先決條件。

有一個記者。在報告開會情形中說道：「參加會議者認識現在開放中國作為出擊直接進攻的基本根據地之前。蔣委員長與共產黨之間內部的不合。一定得予克服。這以後。重慶來的消息。沒有肯定地說到底有沒有向解決問題方面有些進展。但是人們都相信。政府代表與共產黨代表之間在進行直接交涉。我們更回想起抗戰初年。在敵對陣營中是有一個共同合作的協議的。此後雙方都控訴對方違反協議。但如果給雙方一定的壓力。則最初大抵相持的協議是可以重新規定出來的。這種壓力。很可能從中國與盟國來的。因為明顯的。原來可以當作中國自己的內爭來看待的問題。已成爲影響到太平洋戰爭的性質。與時間長短的一個基本問題了。」



煩惱的中國

愛金生

（作者爲紐約時報駐華記者，他這一篇重慶通訊，登載於四月十八日的國報上。）

重慶方面，雖然沒有一個政府人員，聲稱中國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國外對於他們的反民主傾向的愈來愈多的批評，却已經引起了他們不少的關心 and 憂慮。中國是四大盟國之一，他想保存他的名譽，不願意人們說他是極權的法西斯反動國家。

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中國曾經過了一個軍政時期，據國民黨宣佈，現在是由訓政到民主的過渡時期。在戰後一年內國民大會將被召開，用來制憲及建立民主政府。但是，只要看一看全國憲兵的數量，和用來限制共產黨的軍隊與警察的數量，就使人不禁懷疑中國是否已經脫離了軍政時期呢？言論出版的自由的缺乏，顯示着目前中國民主的訓練是無效率的。自從訪英參觀團於一個月以前回到中國後，重慶報紙就在暗地裏討論英國評論自由的制度。在英國人民是相信他們所讀的書籍的。

美國對於學生思想統制條例的批評，也引起此間許多不安。

因爲中國政府總是在暗地裏做事，只在偶然的時候作一次聲明，所以對時局情形，只有從謠言方面去摸索。目前的謠言，就是下一屆國民黨中央全會開會時，檢查制憲將會取消或放寬，國民黨將與民主化或者也許推行地方自治到一定程度，使地方官吏由人民選舉，不用國民黨委派。而現在則至顯政府是由一個已經失去革命精神及進步性質的黨來支配，只要遇到次序先後的問題，國民黨總是被推在政府的前面；比如在政府名錄裏，便先推以蔣介石爲總長的國民黨，然後推以蔣介石爲主席的國民政府。

在中國的反民主統制下，出版的統治最能瞭解人們的感覺。比方說中國人民教育程度不夠，不能讓他們吸收帶有抗敵性的意見和事實。在此過渡期間，只應寫些好聽的東西。這裏的文學，是要將生活和人民理想脫離。這裏的報紙，只作爲記錄家庭起居出入和描寫一羣學者或士紳的活動。在一個高

的，有體統的權威的成功的社會中，那是最爲寶貴的了。言論是統制很嚴，目前的一切，以至於凡是漏過檢查網的一點點的對政府批評，都會引起驚、異、流言和推測。沒有自由輿論的政府，就隨處做着光其自己的聰明能力來處理日益瀕危着他們的嚴重問題。政府和人民是隔離的，而人民却是民族國家活力的的泉源。

國民黨內部的不安與批評，日益增加。孫科的演說，可以說是許多不滿情緒的結晶。但如沒有言論自由，國民黨所能得到的，也只會限於反映那些厭倦政治的中國人民之消極的冷淡而已。

國民黨下一次的中央全會，無疑的將會作出一些應付國外批評的新的決議，蔣介石講會談法傳談的情形，對於外國批評家較有應付。雖然蔣介石的意志是最高的權力，可是他的政府和中國人民的關係，却是不密切的，目前的中國是不能滿足國外自由主義者的批評的，中國現在據說有許多困難，所以不能解決這個大問題。但是，如果在兩年或者三年以前，中國解決了這些困難，那麼就可以避免今天的許多困難，並已解除其煩惱了。

論中國形勢

（四月六日中國問題演講）

我們太平不作戰的總目的，是要達到中國和平，但假使沒有一個戰時的計劃的中國來配合我們計劃，則就算達到了中國海岸，也是沒有什麼益處的。關於中國的消息不流通，而且是單面的，中國專家所知道的比較表的要多多，但是應該承認，他們所知道的事並不令人驚訝。

中國是在通貨膨脹的痛苦中，那是自蔣經史以來最壞的一次通貨膨脹。重慶依靠印刷鈔票來應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開支，而這些鈔票又要飛往重慶和山才能運到中國。因為孔財長限制鈔票總額最大為二百元，這些空頭的鈔票佔據了不少的存額。重慶政府和美國軍隊中間，曾經因為美鈔的換取有過若干爭執，官方換率是一換二十，黑市則換二百多，若照官方換率，則美軍需糧本工作而用的一切款項將要大得多。這個爭執，已在談判中，可能達到一個可以接近的協議。人們會問：為什麼中國政府還保留着它的不值錢的貨幣，不取消它與新發一種貨幣呢？答覆是：除非等到中國政府有國家總收入時，發行新的貨幣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官也會像舊貨幣一樣跌下去。目前中國政府也有所謂徵收糧食，它得到徵收大部份用來養軍隊，但這只是在書本上叫稅收而已。平時軍隊就徵收糧食的，現在也徵收，不過現在叫做徵實糧了。近來政府提高軍隊薪餉，但只是對官某如此。一個士兵拿得到一點糧食及二十元的月薪。這二十元月薪能夠做什麼？只像有一塊錢的價目便可知道，吃一個菜錢是五十元。

在一個經濟較為進步的國家，這樣的國家，這樣的通貨膨脹，便是致命傷。會致政府的死命。但最重慶政府却不會因受這威脅而倒台，雖然它的努力已經削弱，這一朝則使重慶統治下的各種勢力自然系聯起來。按規律，一個有力量的政府，是會放鬆它對國內的統制的，而受驚擾受威脅的政府則會更嚴守制。重慶政府已在國難中度日，因此自然的或者不可避免的它變成了反動，而它的份子則變為

蔣委員長著。

國民黨係重慶唯一政黨，他在法律上是最顯赫的。他和其他一黨獨裁不同的地方是蔣委員長對中國民主。並以孫中山主義為藉口，與有時一些有希望的徵象指出這句諾言或可實現。但是蔣委員長對抗日的八路軍、中國共產黨人，却被隔離在華北，而蔣介石的一部份最好的軍隊，則駐在他們區域的邊界上，顯然地來封鎖他們。國共兩黨的和平合作，說來比行來容易。我們務託的是，在我國（指美國——編者）留學的幾百中國學生，也是在一個重慶官員的監視下，這官員執行對留學生的「思想訓練」。我希望這或者不會如想像的壞，但這決不是美國所希望於中國人的。不過這是中國內部問題的一面，我們也無能為力。

在這戰爭中，通貨正在膨脹的厲害，中國正在被封鎖。自從日本解放出來，還須相當時日的時候，愛中國的美國人，常會到中國內部事件上發生偏激的情感，這種情感的危險，就是會削弱我們對中國人民的基本的同情。美國政府已有決定天下太平洋和平的長期政策，我們擁有一個強大的海軍來達到這個目的。但這海軍本身，不能保持和平。他們只在和平被損害時出來戰鬥，保持和平要靠美國對亞洲國情聰明地瞭解與清楚地感覺興趣。如果我們能夠幫助中蘇親密合作，鼓勵中國民主化，鼓勵他把力量放在製造和平的而不是戰爭的東西上，用我們的力量幫助東南亞的民族獲得獨立，則戰後亞洲將有和平。如我們看見中國如此便大發脾氣，失了禮節，那我們便會使美國人發生偏見。反對一切中國人而不是反對我們所反對的一部份中國所發生的事情。雖然無疑的，重慶政府有點名不副實，但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抗其責任是巨大的。這道責任首先要有憐憫和忍耐來償還。在這裏，美國政府就有一個好機會，因為他應該充分的向重慶領袖們表明說：他們自己的前途與英美關係的前途，依然於提早在中國推行民主，及同時堅持反抗一黨專制的趨勢。

近來若干中國問題是被討論着，其中之一是美國記者訪問華北八路軍，經過許多猶豫後，重慶似乎答應了，其次是利用在雲南邊疆訓練美國裝備的華軍問題。這些軍隊是在蔣介石指揮下，但直趨滇西，並未開入緬甸，出擊日軍會後來擊殺滇北戰線。據今天某些材料與報章報導：這些軍隊有可



能加入戰爭。據報記者談論及日軍最近可能準備一國大的行動。平漢鐵路輪船道有一百哩未入日本人
輪手。在船離港時日深的今天。他們將要由內地到雲南及馬來亞的陸路。日軍準備新的大行動。已有
許多款備。日軍調來新編隊伍。可能是用來打通滇緬百哩路。他們或者會佔領或毀壞正在運輸中的及
已為美軍所用的航空製油池。據聞在河內有五百人的長沙的軍隊。由美國空軍支援。他們應該可以
打得很好。

中國軍隊的實情

I. K. 羅卓英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日「外交政策公報」）

在緬甸或印度東部大規模戰爭爆發的時候，對於聯合國最有利的，是希望中國能對日寇發動擊制性的戰爭。並且如果中國一旦用作對日本滿洲和中國沿海各地大規模轟炸的根據地，中國軍隊有沒有力量阻止日軍奪取機場也是很重要的。這個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重慶的軍隊將來以能繼續進行最廣泛的戰鬥呢，還是重慶軍隊縱然有若干困難還能更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及較多的外國供應品以發展新的打擊力的問題。

自始即應了解，由於中國對抗日戰爭會有非常的貢獻，美國政策在珍珠港事件前後會有許多改變。美國人並沒有特別的道義上的權利來批評中國的，但如一個同盟國考察另一個同盟國各種活動，從中提出可能的改進的建議，則是必需的。因為無疑地在過去一年半中，中國戰場上除有幾次比較大但還有限於局部的戰役外，僅只有一些不重要的接觸。由於運動戰所引起的不大的接觸積聚起來，也很可解那是不錯的，但這並不能解釋在華日軍的顯著的減少。重慶也承認戰鬥已減少了。

據本年三月官方發表的公報，一九四二年被擊斃的日軍約五萬三千人，前一九三八年則為十四萬八千人，一九三九年十三萬六千人，一九四〇年十一萬四千人，一九四一年十萬五千人，擊傷日軍數字，也表示出相同的下降趨勢。這些數字本身，能否解釋軍事行動所以式微是值得懷疑的。每個中國團體觀察家，業已知道，設備困難和其他原因，不僅使中國人民生活困難，而且不可避免地還妨礙了軍隊的效能。在另一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華北及西北進行運動戰和游擊戰的十八集團軍，對於他們的現在的戰果，不但沒有減低，而且比較初期時更大許多。到過那裏的外國人告訴我們，這些新區裏面，補償膨脹和設備實屬少極少。

在軍事組織問題上，可以看出，有許多尚待改進的地方，中國軍隊將於一九四三年六月

二自衛團被撤了，新兵待遇條例也，表現着新兵有各種各樣的缺點，嚴重地違反了規定，如兵工廠、新兵的被服、糧食、被服等的東西，是受到嚴重壓迫的。士兵的食糧中，不得加入沙子和其他東西，口糧重量規定的是「天二十四兩」。軍官可以命令士兵為自己的部隊或他們所駐紮的地方服勞役，但不得妨礙訓練，士兵所做的工，官長不得收費。事情實至於規定這些法令，這一事實說明了軍隊中的情形，更特別重要的是戰爭已經過了六年，中國的徵兵法還沒有充分實行。

上面所敘述的這些情形，是決不能說是由於國外供應困難所造成的，基本上還是要從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等環境上去找得解釋——如投機商人所把持着的重要地位，人民建立和執行行政力量的薄弱，以及某些軍隊還保存有內戰時代軍閥的殘點等。這並不是說中國人民從一九三七年以來的進步可以忽視，或者說中國不成其為國家，這也不是說希望國民政府能夠很快地就掃清它本身的缺點。這每一年都是中國行動的方向的問題——中國到底還是願意回到抗戰初期統一進步的政策上去，從有效的軍隊那些消耗軍事力量的條件呢，還是願意那深內部困難，在聯合國戰爭努力上使自已得到一個不屬權重的地位上去？

中國的通貨膨脹

塞德來特

（一月三日美國新共和雜誌——新華社）

今天中國流通的貨幣數量，是大得使人萬分驚異，以致使中國陷在嚴重的通貨膨脹危機中。

美金一元的購買力，在二十元法幣換一元美金的匯率之下，只值五分錢。美金一元可以買到半包煙腳的紙煙，或半磅花生，或是六張整腳的打字紙，或是坐一趟重慶的特別公共汽車，非幾條街之後再買一盒洋火。一雙新皮鞋要六十美金，一個提包五十，舊雨衣二百。我們第一次在重慶上館子，四個人五十元。

奇怪的是雖然日本佔領了中國最好的工業區域，控制了鐵道以及所有的海口，致中國不能從海外輸入日用品，然而你可以看到郵遞裏滿是奢侈的奢侈品。在我們去年充美金吃東西餵飽之後，我的履歷表我在街上閒溜，到處能看見從上海、香港或東京來的非必需品以及裝飾用品。

一年以前實施限價計劃時，蔣委員長在國民參政會上曾說過：「統治物價方案尚未完善」，這是有點輕描淡寫的說法。在參政員的討論中，說明了在有些省份比說一九三七年來物價漲了二百五十倍（百分之二萬五千）。月薪水過日子的當然受害最次，就是薪水高的外交人員也很艱難。因為他們們一定只能以二十比一的匯率兌換錢。有一個大而富的國家的大使，聽說說是在緬甸穿林裏穿衣服，手錶了，自願要買給我一件襯衣。正在那時，大使的僕役長送進來波蘭一等秘書的名片，大約請他進來。還叮囑僕役長把名片遞給那秘書，名片是很貴的。最近我在重慶大學的宿舍中說明了擁有大財產的人和大地主們的生活和戰前一樣的優裕或更好些，小的白耕農的收入量比戰前少了百分之十，商賈及店主階層的實際收入降低了百分之十二。普通士兵與教員以及許多公務員甚至極端的貧困，甚至於營養不足。我認識有些教員，至今還能夠活著，只因爲他們的朋友勸誘美國人私人捐助他們。

七月十二號，政府給官員規定有特別津貼，但是這是不夠的，中國的某些最優秀的作家和藝術家，因窮窮不能工作。

最近美國要運金條到中國以扶持搖搖欲倒的財政機構，當我離開重慶的時候，中國政府尚未決定如何使用這筆金子。他們可以以這筆金子為基金再發鈔票，也可以把金子拋售在市場上，定價每兩中國法幣一萬元，在中美官方匯率之下，金子可合中國法幣七百元一兩。因此他們如果採取拋售政策，可以做一筆大買賣，如果脫售金條，那麼買的人一定是中國在戰時發了財的人。他們這就可以使自己的戰時財產穩固起來。在這個情形之下，大部份金條一定會匯轉流入日本佔領區，這就是說落入日本人之手。

最近中國已不得不開闢稅源以維持軍隊和政府，許多農民甚至災荒區的農民，眼看他們全部穀物給富地的將軍們軍閥們或縣長拿走，你可以時常碰到有些農民，他們的全部收穫已經抵押作好多年後的賦稅。

中國的最大開支，自然是政府及軍隊。在今天這方面有了些進展，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二十可以稅收來償付，和美國的比例差不多。如遺產稅與所得稅的紙上計劃真正實施了的話，則可以徵收到更多。但在一個不以法律統治，而以個人影響統治，而且政府又全部操在地主與金融家之手的國家裏，那是難以辦到的。

中國的通貨膨脹，實在令人担心，但政府的重要人如中國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緊信着通貨膨脹可以在現在總率之下繼續二年之久，才會總崩潰。有的人是很相信他的，中國是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業經濟的國家，它在正常狀態下可以糧食自給，農民——這就是說差不多中國全體，即使全部廢棄通貨、物物交換，也還可以過下去，他們以前就這樣做過。但是如農民真的開始物物交換，這就是說對政府失去信用，當那時候來到，蔣委員長的統治將受到真正的考驗，所以他企圖使人民相信中國可以在兩年內還債日本，相信到那時海口重開，又可進行生產，那是不足為奇的。他的統治，現在是正懸



美國的經濟，由於通貨膨脹會不會崩潰呢？誰都不敢十分肯定。人人都存在提心吊膽。孔祥熙博士向他的美國朋友這樣說：「我們正如同烏爾瓦士大廈屋頂上墜落下網人一樣，當他過二十二層樓時，他說：『直到如今還算好。』」

中國的內爭

原文集紐約時報

開羅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電——關於對待蔣委員長政府最困難的一點，就是中國的異常複雜的政治局勢。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前一九三七年曾經蔣委員長的政府所容納，兩方面在一起合作了一年半多，雖然雙方彼此都有戒心。

到一九四〇年，中央政府開始公開譴責共產黨，而成爲一種也許可以描寫爲放大的巴爾幹混亂的情況。

在華北的許多區域，日本人統治了城市，共產黨統治農村，有很長的時期，中央政府害怕共產黨會與中央與日本軍事合作，奪取長江流域。

在一九四〇——四一年，中央政府與蔣委員長新四軍沒有成功。

目前共產黨正被蔣委員長的政府封鎖在他們的西北。要寨內，延安是首府。

封鎖影響及於一切，包括英美送給中國的醫藥供應品在內，而共產黨只能被追趕他們的現有的物資。加上由敵手竄竊獲的武器生存下去。

然而他們在許多方面比中央政府抗日更爲積極，他們的游擊隊更爲有效。

蔣委員長將軍以監督租借法案供應品給中國的人的地位的設法保證這些器械不是被中共用來對付中央。

中央政府統治比共產黨更大的區域，而美國除了經過共產黨可在重慶保持的辦事處外，和共產黨沒有關係。

在共產黨這一錯綜的問題之外，在盟國內部，還有救濟飢荒的人民，消滅疾病與滅絕已達天文數字的新質應有的關係。

中國近況

（譯自四月十四日美國時報週刊）

（一）一個孔教徒的狼狽——體質文弱，但面孔漂亮的中國教育部長陳立夫，去年十月間獲得一重大勝利，他伸出他對中國思想界的獨權，而波及美國。他的教育部，宣佈了一些新的條例，論及在每一個外國成立一個機關，來「指導統治留學生的思想行為」，留學生對這些思想統治者們要絕對服從，「如果他們的言論文章有違反三民主義被報到教育部時，他們將要被遣送回國」。二月間，又頒佈了對外國的教授講師的同樣條例。如果這些條例不引起哈佛大學哲學系的注意，則一切皆可順利進行。培萊以哈佛大學「保衛美國教職員團」領袖的職位，要求政府對此事進行調查，如果認為是惡意的，則拒絕中國學生入境。培萊謹慎地避免說這種制度有類於日本思想統治制度，那是可以令美國教育界注意的。

（二）上星期在重慶外籍記者招待會上，爲了培萊的事件和紐約時報社論的批評，中國政府出來解答，說話的人是政府三個代官中最能幹的張平茲博士，他輕輕地把這個爭論認爲只是誤會，他隨後的英文譯錯了，應該是「指導留學生的思想和管制他們的行為」，不是「指導管制他們的思想行為」。至於說到爲什麼留學生出洋前要受訓，只是「教他們如何吃飯，不要把刀子放到口裏」。但是，陳立夫對報界的正式聲明却說：「中國臨時憲法上載三民主義是中國教育基本原則，正如民主是美國教育基本原則一樣，是不容違反的，違反三民主義的中國人，就是違反抗戰利益，學生是不能例外。」這些說話很有趣，但沒有人知道它實際上指的是什麼。說重慶也好，美國也好，國際家都圍繞着陳立夫偌大的老師孔夫子的一句話用他自己身上：「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三）蘇科要開通整，在外國的中國朋友亦零星談及有一個著名的中國人，已大膽地綜合地說

來了。孫中山的國家在民主前進的路上把經驗給，只要進了黨，就放棄民主。說這話的人不是別人，而是立法院院長。他說這話對一黨專政的話的地方，是連一個國民黨的會議去。蔣介石把孫科的演說，從嚴厲的檢查中檢出的目的，是在表示：（甲）重慶對盟國的意見並非沒有注意。（乙）雖然事實有錯誤，但並不如一些批評家所認為那麼嚴重。

中國內部的危機

下·V·費爾特作

（原文載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日「新觀察」雜誌）

幾天前，紐約方面得到了孫夫人的一個電報，說有四卡車的藥品，經長期後終於穿過對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軍事封鎖而到達西北。在抗日戰爭的幾年裏，中國共產黨會從這個區域有效地擊斃了侵略者半數以上的兵力，奪取敵人供應品，破壞敵人交通，並組織了廣大的鄉村以進行最大的抵抗。由於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黨——同時也就等於是政府的——國民黨內頑固派與失敗主義者的影響，從來沒有一粒丸藥、一紮綑帶或一枝槍被准許到達英勇的游擊隊。

如讀孫夫人的電文，更證實了從其他來源所得到的中國內部情況依然危急的印象是對的。她的電報上說：「我們要記住，向民主前進，正如游泳一樣，不是口頭說說可以學得會的，而是要進入到水裏去才行。反軍事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提供了另一尺度，誰是盡全力與侵略者作戰，誰就對民主最有貢獻。美國的朋友們，可以用給一切真正抗日的份子以同等的援助來幫助中國的民主政治。」這些字句，不是偶然的。今天在中國，有些人對民主的真獻只有在嘴上，有些人不在真正的打日本，比這更壞的，有些主要份子包括某些在政府和國民黨據高位的人們在內，以其大部份時間，專心致力於煽起分裂和內戰。中國剛剛才渡過了一個最嚴重的危機，內戰真是極危險地避免了，但是內戰的原因却未曾消除。同盟國家四強之一，由於內部的不團結而軟弱到極危險的地步了。

人們希望着最近蔣委員長言論集（抗戰建國，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三年在中國六年戰爭的言論）哈羅斯書局再版）將澄清中國內部的糾紛問題，因為在遠東舞台上沒有一個問題比這更為重要，在聯盟國所遭逢的一切問題中，也少有可與它相比的重要問題。遺憾的是這本書所透露的比普遍通過盟國的檢查與宣傳的迷霧所透露的多不了什麼，在涉及國共團結的問題上的幾段話中，除了戰爭初期動搖之外，其特點是對於左派的強硬，並不願意把領導權交給真正代表中國的利益的進步勢力來完

遠他擊敗日本侵略者的願望。但不論如何，他的當時演講的出版，配合其他手頭的文件，給我們考察中國內部的爲團結的鬥爭提供了一點頭緒。

一九三七年夏至一九三八年後半年，是國民黨、共產黨以及中國其他黨派的團結的高峯。一九三八年秋，民主的勢力有如此之廣大，引起國民黨反動派人們發動了一個拚命的反攻。一九三九年初，這批失敗主義者，在本國內團結遭受嚴重的破壞上是悲慘地有成就的。一切愛國黨派都認真地努力使政權回轉到民主方向來。但是國民黨的黨務機關和特務的反動集團的統治却使這種嘗試陷於失敗，開明的進步份子充其量只能使情況穩定於極低的水準上。當一九四一年正月，新四軍事變，國民黨的軍隊殘酷地屠殺了一部份在華中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優秀的隊伍，團結已降落到了最低點。

一九三九年初，國民黨五中全會的開幕，蔣委員長提出警告：「諸位同志，更應該使全國同胞明瞭我們今天務必要以宋明歷史爲前車之鑒。要知道宋明的滅亡，並不是外族有如何優勢的力量，而完全由於當時政用少數將吏份子、社會上流意志精神的動搖畏怯。」在蔣的言論中，唯一的一次想指明這少數動搖畏怯的什麼人，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國民參政會的開幕詞裏：「一般社以除少數……愛國人士以外，多優游安逸，過其平時生活……至商界取利，更加利用非常時期，販賣私貨，囤積居奇，不惜禍國害民，坐收漁利……妨礙戰時法令與經濟政策的徹底實施。」

可惜這幾段話並不能代表蔣委員長對內部團結問題一貫的看法。其典型的偏向，是對於國民黨內部無論在進步的或動搖的力量，都加以袒護，而歸咎於共產黨，因爲這後一種觀點，在美國報紙上有廣泛的宣傳，不僅共產黨的地位被漠視，一切非國民黨的黨派和國民黨的部份也被漠視，所以必須加以辯明。

蔣在一個月前，對國民黨高級人員的演說，是他詆毀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偉大軍隊的典型方法：「如果共產黨果能真誠踐言行相符，則中央可視其尚有勸導抗戰之誠意，自當重加愛護，俾得共同努力，完成抗戰建國之大業。」

這些話和蔣委員長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屆二次參政會上所說的幾乎是一樣的，他以暗示共產黨敵

領了的更從而證實共產黨所不應實遵守的規定條件。這說呢？據他說，就是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宣言所表示的：（一）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二）放棄反對國民黨的內戰，（三）取消蘇維埃政府以形成統一，（四）取消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直屬國民政府之軍事委員會。共產黨是否答應了這些條件呢？是否遵守了呢？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從一九三七年頭十個月的中共領袖的言論中找到。我們必須記得，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國共產黨已經號召過一切抗日力量的團結，當時由於蔣委員長之下的南京政府，對侵略者的緩靖政策，還看不到把政府也包括在抗日陣線的可能。但不到一年後，一九三六年春，中共領袖毛澤東已直接要求蔣及其政府與共產黨及一切愛國黨派聯合組成鞏固的抗侵略者的民族陣線。爲團結而鬥爭的第二塊里程碑，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變。共產黨之營救被綁的蔣委員長，打開了和共產黨代表直接談判之路，標幟了合作的開始。這一合作，在一九三七年得到了很快的進步。

根據這一時期公佈的記載來看，無疑地共產黨自動提議在基本上改變其政策，同時並號召中國政府採取團結所必需的步驟，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澤東在延安答記者訪問裏，對於時局作了下面的總結：「共產黨的讓步，是爲要與國民黨合作，以完成「民族統一戰線」。讓步的成立，在國民黨必須實行下列三項必要條件：（一）爲中華民族求解放而進行抗日戰爭，（二）實現一種民主制的中國共和政府，（三）改善人民生活。」

在這種諷解之下，共產黨有了些讓步，譬如：改編紅軍的番號爲國民革命軍，直屬南京軍事委員會，在中華民國境內取消蘇區這名稱，而改爲「特區」，停止反對國民黨的暴動政策和取消沒收土地政策，這些是爲肅清中國兩大政黨的敵對行爲而作的。另一方面，國民黨也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同時在八路軍和「特區」內，共產黨保留了他自己的獨立的領導地位。

在一九三七年的上半年，共產黨已一一執行了團結的四個條件，那四條是國民黨在頭一年二月的中央全會上所宣佈的關於紅軍的改編。共產黨和國民黨長期談判後的諒解是完全清楚的，毛澤東和朱德把這點意見告訴給在一九三七年七月間到延安訪問的四位美國人，後來由其中之一編寫把它寫在德

的「日本在中國一書」裏。

「在七月，紅軍也將直趨南京的中央軍事指揮。它的名稱大概要改爲『國民革命軍』。它的各個師將順着國民軍的數目編排，南京方面不派指揮員，該軍仍由他日已領導人担任軍官，他們在洪蔣介石爲委員長的軍事委員會指揮下作戰。」必須注意，蔣在一九三七年九月發表宣言時是知道了條件的實行及其已經實踐了的具體方式，他說：「此次中共發表之宣言，即爲民族意識時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發動政策與赤化宣傳，取消蘇區與紅軍的蘇維埃中力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

很明顯的，蔣委員長對共產黨所採取的步驟是滿意的，後來兩湖月（實際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事實都證明在當時在國民黨中佔主導地位的地位，對於正在進行建立與共產黨合作的基礎這回事是滿意的，因爲就在那時，政府自身採取了一些走向民主化的步驟：內戰停止了，開放了大政治犯，有了相對的集會與言論的自由，而且在某種程度內還發給新編的八路軍軍餉與補給。我着重地指出這些事實來，證明一九三七年秋以及後來一九三八年八月間蔣委員長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言行處處都表示對於共產黨所堅決要求的團結的綱領的滿意。換句話說，這一時間的記載，證明了國民黨蔣委員長後來宣稱共產黨從來沒有實踐過宣言的立場是如何的不同。

今天在六年後，我們有充分的證據，來證明共產黨對於他們的團結的綱領是信守不渝的。在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美亞雜誌上，P. J. 賈弗列舉了幾個訪問過中國西北的人們，他們把共產黨的工作和政策給我們以親眼目睹的記載，因爲每一個觀察者都說到共產黨言行的「一致，其名稱是值得重複一過的」。

可是另一方面，情景又是怎樣呢？國民黨實踐他的條件沒有呢？這裏當初民族團結的條件與國民黨實踐其語言的程度，正如共產黨的情形一樣，是有案可查的。我已經引用了毛澤東的話來指出國民黨方面如要負起對民族團結的責任所應該採取的政策。共產黨同意把紅軍改稱爲在委員長最高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在政府方面，其責任爲供給前線共產黨軍隊以軍火彈藥軍餉及藥品，在最初曾經交付了一些供應品和軍餉，在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對西北的經濟封鎖是開放了。隨着一九三九年政動紛爭

國情。以爲的每步是停止。不但從此再沒有談判，而且連談判又重新加上了。國民黨以七、八、九萬裝備精良的部隊，駐在「特區」邊上，以保持封鎖之有效，並阻滯游擊隊順利地索制日寇。在民族團結這一點上，國民黨所担任的職是如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的談判中的那二個與此有關的提議是：立即召開由各軍事派系代表參加的國防會議，以討論當前民族的緊急的軍事問題，判定抗戰的職時，當時國民黨表示召開國防會議的時機尚未成熟，他們此後從未進行過談判會議，而且也沒有設立過任何與此有絲毫類似代替過提議的會議。恰恰相反，國民黨對於與共產黨共同作戰自一九三九年來，明顯採取觀望態度，不止一次有少數次，最厲害的是一九四一年初襲擊新四軍，殺害其領導人及士兵，國民黨是有意地挑起內戰。在解散蘇維埃式的政府以促成國內統一的這一條上，國民黨所實施的戰是如此。

政治上，共產黨同意取消蘇維埃政府，以西北爲區屬於國民政府之下的「特區」，他們還開始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愛國的資產階級份子積極參加的政府，自然作爲答覆且當作團結的先決條件，國民黨有使其政綱民主化的義務，這就必須召開國民大會來創制憲法，並迅速採取一種澈底的社會的及經濟的改良，從實現堅持抗戰與及時的軍事反攻。

事實究竟如何呢？國民黨曾宣佈要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新憲法，迫於戰事，國民黨允許將會期延遲到下一年，這會議至今從未開過，而且在今天意欲離國民黨計劃之遠還甚於一九三七年夏。一個月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佈，不到戰後一年不能召開國民大會。當大部份黨報報紙都正讚許此舉認爲是前進了一步之際，從已往的記載的宣傳考察，則完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這不過是國民黨無限期的延遲中國民主政治的一種手段罷了。孫夫人電文上說：「向民主前進，正如游泳一樣，不是口頭說說學得會的，而一定要進入水裏去才行。」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的大規模軍事襲擊後不久，正在內部關係改善的時期，國民政府在設立一個邀請國民黨以外的重要領袖參加的國防參議會時，是向前進了一步。一年後，國民參政會繼續代替了它，參政員的人數較前者增加了一些，各小黨派有代表。到了一九三八年，當局更加強化了這個體

純粹建議性的地位。且減少非國民黨代表的名額之後，它之可能變為一個真正的全國的立法機關的前途，是阻塞了。省和縣參議會，本來沒有全國參政會那麼民主的，則愈來愈屈從當地的國民黨組織。

國民黨為適應人民的需要而作的最有內容的一個嘗試，是一九三八年正當團結高潮時所頒佈的抗戰建國綱領。這綱領包括外交、經濟、政治、教育、軍事等各方面的問題，而且彼此切非國民黨的黨派認為可作共同作戰努力的真正基礎。對於如：「加緊軍隊之政治訓練」，「指導及援助各地武裝人民，在各戰區司令官指揮之下與正式軍隊配合作戰」，「有不忠職守、貽誤抗戰者以軍法處治」，「嚴懲貪污官吏、並沒收其財產」，「以全力發展農村經濟，獎勵合作」，「嚴禁奸商囤積居奇投機，實物物品平價制度」；「在抗戰期間，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與合法之充分保障」的號召，人們是寄予極大的信賴的。這一綱領，還允許劇烈的軍事改革，命調軍官之訓練及新兵之經常徵集。從這裏，有着一個新的中國的希望，一個以真正人民戰爭來擊潰侵略者的中國，一個在戰爭的過程中藉大眾民主力量得到完全獨立的中國的希望。

但是，這綱領實施得如何呢？其成績是小得可憐！有一小部份的賣國賊，在發展合作事業上，實行了「一種官僚的步驟」。設立代表非國民黨份子的研設機關，在開始是似乎有前途，到後來發展成爲與其初衷完全相反的東西。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事實的真正發展是這樣的，共產黨的民族團結的諾言已完完全全並且無條件地實踐了，國民黨方面則全部諾言幾乎全部失信，而且還繼續包庇着挑撥離間的份子。

雖經重慶檢查的嚴密的辦法，中國內部情況的極端嚴重性早已衆所周知。美國政府的各部份，無疑的英國政府都對這件事已都知道得很詳細了。威爾斯任副國務卿時，清楚認識到中國重新有內戰的危險，這才發出一九四二年十月反對中國內部不穩的警告（威爾斯在給白勞德的備忘錄中說：「美國政府願意中國團結，而反對中國的內戰……」）。最近數月來，在美國出現的字句強硬的文章，是由於內戰危機的復發而引起的。這些文章，特別是麥珍珠（註一）、畢生（註二）、羅辛格（註三）、史溫（註四）的言論——當然是代表私人不代表計劃政府的政策，然而他們却反映了大家公

認爲是官方的意見。羅果夫發表在八月份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上的文章，可以作爲蘇聯對當時中國的危機看法的表示。

這件事對於同盟國共同作戰的意義可以從羅果夫的話裏看出來。說：「日本現在集中力量，以使中國內部的矛盾加深與尖銳化，想一切方法來利用這些矛盾，在反對中國的鬥爭中，削弱中國、增強自己的地位。對於日本的這些計劃很有利的是中國「綏靖份子」的活動，他們挑撥離間，推浪逐波，直至武裝衝突，以最大的努力破壞國民黨方面和共產黨的合作，煽動迫害和消滅八路軍和新四軍；而八路軍和新四軍是中國統一的國軍的一部份，是曾經在中國國民抵抗日寇的歷史上鑄上了許多英勇的史頁的。」不幸的是正如羅果夫所說：「中國政府並沒有堅定起來，克服這必然會被破壞民族團結和削弱抗日戰爭的投降份子的活動。」

中國所剛剛經過的引起了上述的評論的這樣危機，是整個抗戰期間最嚴重的一次。今年春，政府派遣了五個師加入原來封鎖游擊區的大量部隊。毫無問題，這幾師是明顯的爲了襲擊西北共產黨所領導的部隊的。由於幾個因素，內戰是暫時避免了，其主要的原因是共產黨六月間在延安所召集的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所採取的堅決的立場。這會議的結果，是迅速地報告給重慶了的，重慶方面得悉了兩件出其意外的事：（一）共產黨比他們原先估計的要強大得多，（二）他們拚一切所有的來抵抗國民黨的襲擊。別的一些制止重慶反動份子的因素，是重慶發覺了華盛頓不但完全知道「國民黨中國」的發展，也知道延安的發展，重慶還發覺美國對任何走向內戰的步驟不與私毫的同意。另一因素，也是支持上述的因素的，是在美國及在蘇聯對中國內部情況的廣泛的宣傳。最後，就是去夏曾有的「如一九三七年以來所有的中國人民大眾最強烈的反對內戰，擁護抗日的民族團結的情緒。」

從這些證據中所發露的中國的內部情況，是令人消極的，然而在反面，我們必須記住——而且我們盡力強調這點——這些年來，中國人民曾經抗拒了失敗，雖然不團結，雖然有反動份子的影響，雖然失敗主義者投降份子及直接了當的法西斯蒂屠於高位，重慶方面主戰派——包括蔣委員長在內——的弱點雖然如此，中國人民已忍受了難以形容的痛苦和損失，而勇敢地繼續了可怕的鬥爭。民主世界

對中國人民更有永遠的感激。中華民國從中國歷史的無盡大火中升起。其永遠的功績必須歸諸人民。

現在結束這篇文章，讓我們自問，中國內部團結的問題不應該是美國人所關心的呢？我們在這邊上有沒有以這樣尖銳的方式來討論我們盟邦的內部問題的權利呢？把中國的傅帕子當衆揭出，是否我們的事呢？我們這樣做，能否有助於一個有用的目的或者還是使事情更壞呢？答案是：中國內部的團結與我們有極大關連。孫夫人以要求我們「用給一切真正抗日份子以同等的援助，來幫助中國的民主政治」回答了這點。中國人民通過她和別人要求我們幫助和鼓勵，此外對於一個共同敵人通力作戰也需要我們這樣。我們要求我們的盟邦的，正如他們所要求於我們的相同，是最高度的團結和最高度的作戰效率。在珍珠港事件前，我們的中國朋友們，正確地提示我們和日本妥協的嚴重問題，他們的批評幫助了我們的進步力量去打擊這可悲的政策。今天不以其巨大的力量作戰的是中國了，給她所遇的軍事與經濟的困難以充分的考驗，明顯表示他的內部政治的不團結是她目前缺點的主因吧！假使日本至其無條件投降，且不要浪費人力物力，達到此目的，實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團結的中國，盟邦因此以一切可能來援助在中國內部致力於消除那些少數的分裂份子投降份子的力量，不但是我們的本分，而且也是我們的責任，以我們毫不含糊的幫助中國人民，是能够完成這一重要的戰爭工作的。

註一：賽珍珠曾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十日出版之「生活週刊」上發表批評中國之「關於中國問題」的警告一文，全譯文見王仁勉編之「他山石」。

註二：學生會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四日出版之「遠東研究」上發表「論中國在聯合戰爭中之地位」，全譯文見「他山石」。

註三：羅辛格曾於一九四三年八月至九月底出版之各期「外交公報」評論中國內部情形頗詳。

註四：史溫美國著名新經濟學家，於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報告中國內部情形。

英國工人日報重新主張

國共合作乃戰勝日本的關鍵

據路透社倫敦消息：英國共產黨工人日報紀念「七七」的文章中，重新主張國民黨共產黨的會
作乃中國戰勝日本的關鍵。作者阿瑟·克利格說：英國官方消息充分證實六月裏出版的蘇聯「戰
工人階級」雜誌關於中國當局「傾在消極的」抗戰的斷言，克利格於支持這「斷言時說：美軍在太
平洋上的前進，迫使日寇發動目前的攻勢，日寇目的在於控制平漢、粵漢、浙贛與湘桂鐵路，由於最
近的「勝利」，日寇想實現這一計劃已大獲進展。該計劃的全部實現能不能被阻止呢？它尙能被阻止
，而其關鍵則爲日寇在華北華中的挫敗。今日在華北華中有兩個中國正規軍——八路軍與新四軍——
爲數五十萬，伴以兩百萬以上有組織的民兵，且有各內地的抵抗——各民主的邊區——其中若干邊區
包括一千二百萬或一千五百萬人民，他們的唯一弱點，便是缺乏武器。克利格根據此點，進而議論中
國對邊區的封鎖謂：「用五十萬精銳軍隊加強封鎖，乃是最近日寇在河南勝利的原由。」克利格認爲
：如果解除封鎖，並把供應品運給共產黨軍隊，華軍是能够粉碎日寇的進攻的。克氏繼續力稱：「結
束這一封鎖，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英美的問題。因爲削弱一個重要的抗日前綫，將使日寇集中
在其他各前綫上，因而不這耗費中國人的生命，而且耗費英美的生命，如果中國政府在這紀念日繼
除對邊區的封鎖，則他們將能予日本以一巨大打擊，此打擊將等於美軍在太平洋與我軍及其他軍隊在
關甸所予日寇的打擊。」

（新華社延安七月九日電）

中國為民主而奮鬥和目前的政治

危機

美亞雜誌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中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危機，仍然沒有減輕。

這一危機的嚴重性，却因為從九月六日到十三日在重慶舉行的國民黨十一中全會，以及繼續在九月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舉行的國民參政會四宣言的發表而更形加重了。

假使這兩次宣言，只限於聲明在戰後一年以內召開制憲的國民大會，或許可以認為是一個令人興奮的表示，這以後的爭論或許只會關聯到用最好的辦法去建立一個民主政府的形式了。但是，當其隨着這個聲明之後，重新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時候，很清楚的，中國的政治危機不但還沒有解決，而且進入到一個新的、更危險的階段了。

部份的原因，是中國的這個危機是六年多消耗性和糜爛性戰爭的必然的產物，這隨着中國的盟友供應它巨額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的失敗而更加劇烈了。中國的領袖們，有充足的理由，怨言不平。在提出聯合國家在亞洲戰略的時候，他們沒有被美英看成平等的夥伴，他們懷恨英美對亞洲的目的也是不是為難的。

中國的責任

但是，雖然中國的美國朋友，真誠地慨歎中國代表被摒除在英美最高統帥部以外，而且有許多認為中國是第二等同盟國的證據，他們也同樣認得清楚，中國本身至少對目前情況要負部份的責任。這

據論點，也有很多理由，例如：中國不能滿力動員它於一戰，以經濟資源從事作戰。同時人們也怕論與中國政府的軍事裝備供應品會用來打內戰。

中國戰時經濟的弱點，已經為許多中國領袖們所坦白地認識到，批評到了。蔣委員長自己在重慶最近舉行的第二次生產會議的致詞裏說道：「散漫游離的資本，必須為戰時生產而集中，不能聽其隨市場一時的變化而為流通。」

蔣委員長並沒有對「流通」下一個界說，但是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許多有錢的中國人，都歸轉土地和穀米的投資到工業生產裏去會更賺錢些。誠如最近大公報所抱怨不平地說的「商人變成地主了，地主變成商人了，而不論商人或地主，都不願投資到工業經營裏去」。

政治和經濟的鏈鎖

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對於中國經濟的死不放鬆，事實上是整個的動員中國資源從事作戰的根本上的障礙。因為地主、商人階級不僅掌握着中國資源的大部份，而且在國民政府以內，也是一個有權力的力量，而且這一力量常被利用來防止政府進行增加生產和防止當前惡性膨脹所需的基本的經濟改革。

因此，正在減削着中國的作戰努力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之間，是有着密切的聯系的。因為這個危機，不僅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爭取權力的鬥爭，真正的衝突的，一方面是反動的可是有權力的國民黨右派，另一方面是國民黨內和黨的各種政治性質的黨派和組織，贊成範圍較大的政治上的民主，以及立即實行和在華北各個游擊區所着手的相類似的農業改良。

今天美國利益和中國利益是密切的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在對共同敵人作戰當中是伴侶，並且我們也認識到遠東的安定而順利的戰後秩序的最確切的保證，一定是一個民主的、經濟上強有力的。政治上團結一致的中國的誕生。所以勸告中國政府採取各種步驟，以加強它的戰時經濟和用擴大民主。而不用強方壓迫小黨派來達成政略危機的解決，並不能算是「帝國主義心理」的懷敵，或者存心毀謗。

中國的英勇成就。

中國今天正處在生死攸關的十字街頭，一條路引導前進到真正的民族團結，擴大政治上的民主和經濟上的改革，這會復甦它的作戰努力的；另一條路，引導後退到增加中國社會的反動勢力壓制民主運動，用窒息人民的創造性的一種腐蝕性的官僚政治的權力，來進行統制和日益成長的公開的內戰危險。

中國將會走那一條路呢？要看這個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就要檢核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關於兩個重大問題所採取的行動來決定：（一）在中國建立憲政，（二）國民政府（國民黨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戰後的國民大會

關於第一點，十一中全會通過決議，在戰後一年以內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並決定實施日期。此外，蔣委員長說：當立憲政體成立的時候，一切政黨在法律下都享受各種平等權利和自由，國民黨不保留特權。

這項決議，已被人們大大稱讚，認為是中國走向民主政府的一個重要的進步依據。中國新聞社社長兼中央宣傳部駐美代表夏晉麟博士的意見：這個決議，證明了國民黨「將要實行孫中山的期於建立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的民主的綱領和政策。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不懂制憲的國民大會的召開，一再拖延到無限期的戰爭時間以後還要加一年，而且這項決議甚至連何日開始憲政也沒有決定，把這個重要問題，留給制憲的國民大會去決定。

另外，重要而不被人充分注意的一點，就是這個決議，並沒有提議改選一個新的、有權草擬憲法的國民大會，相反的，它提到要出席的國民大會大多數代表，是戰前國民黨所選出的；要製定的憲法，是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五年之間所草擬的。

換言之，制憲的國民大會和憲法，純粹是國民黨戰前醞造的創始品，並沒有估計到任何重要的變

時政治變遷，雖然在事實上，今天中國的條件和十年以前不大相同。

馮師夏博士在九月十五日對新聞記者的報導中所解釋的：「決議所提到的『憲法』，實際上所指的就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用國民政府命令所發表的憲草，國民黨對國民政府的意思，是想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開國民大會批准那個文件，可是那年夏天爆發了的中國戰事，使得中國的立憲秩序驟然停止。抗戰以後，這一憲草會被審查過，但是它的大原則和主要條款，最後送到國民大會去批准的時侯，當在戰後仍然會保留下來的。」

所以要估量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的真實意義，必須懂得所提議的制憲的國民大會的組織成分，和將會被批准的憲法的性質。

憲政的歷史

中國向立憲政體前進的歷史，可以簡略的總結一下。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大綱裏，曾經舉出中國政治發展的三個時期：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和憲政時期。

訓政時期，中國人民在一個普遍代表的包括各階層人民的民族的政黨，如孫中山在前的國民黨領導之下準備自治政府，在其全國大半地區都變成完全的自治以後，召開國民大會來制定憲法，跟着就選出一個新的對國民大會負責的中央政府。

這個秩序，從一九二七年以來，一直是中國國民政府的官方政策。一九二八年軍政時期理論上告一結束，訓政時期正式開始，並宣佈其目的是要在一九三五年完成地方自治的準備工作。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集一個國民會議，通過了一個臨時憲法，並且協議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該繼續代表人民行使政權，一直到國民大會成立時才終止。一九三二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議決，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召開制憲的國民大會，此後又延期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再延期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與此同時，立法院完成了一個憲法草案，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加以宣佈。

戰爭爆發

中日戰爭的爆發，結果使制憲的國民大會無限延期。這一戰爭，在中國政治情況上，也是成了一個顯著的變化。這因一九三七年八月有關正式成立兩黨和共產黨合作或「統一戰線」而達到最高點。

中國的各黨各派，已認識到迫切需要一個全民族一致對侵略者抗戰的綱領，並且在抗戰第一年中，國民黨在一些重要方面修正了它的一黨專政，人民的權利大部恢復起來了，包括共產黨在內。各黨各派都得到出版言論和集會的自由了，許多政治犯著名的內戰時期中的自由主義者和左翼的犧牲者大都被釋放了。

一九三八年三月，國民黨在漢口召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這時候政治上的團結到了最高點。大會通過了有名的「抗戰建國綱領」，它被國民黨以外的各黨各派所接受，認為是形成真正的統一戰線的基礎，認為是立即擴大政治上經濟上民主的保證。

在制憲的國民大會召開以前，作為一種暫時的措施，抗戰建國的綱領裏有一條，規定組織國民參政會，（團結全國力量，集合全國之思想與建議，以制國策之決定與推行。）這個會議適時地組織起來了，並且在一九三八年七月開了第一次會，雖然它純粹是一個建議機關，二百個參政員也是指定的，這個參政會却包括了各個重要小黨派的代表，連中國共產黨在內，以及重要的無黨無派的領袖，因此它的形成，向着政府方式上的民主化記錄下一個真正的進展。

紛擾的徵兆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舉行第四次國民參政會的時候，憲政問題又重新提起。對於僅僅一年以前很希望的政治團結和民主的傾向的忽然改變，參政員都為它紛擾不安。這一改變，從小斷取消民權以

國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關係的不斷緊張，都顯示出來了。出席參政會的各個小黨派的參政員，以及許多無黨無派的領袖們，都深信有效的進行抗戰所必需保持的全民族的團結，需要各黨派各團體能參加政府行動的負責工作，因而參政會請求政府確定一個召開制憲國民大會的時間，以建立一個代議政府，作為一種臨時辦法。參政會極力主張，在法律面前應該宣佈所有公民的政治地位（漢奸除外）的不平等。

政府對於後者的主張，沒有作任何回答。但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上決定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應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並且決定代表的選舉必須在六月以前辦完。然而到了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五日，却宣佈這個大會選舉延期，除去就在戰時條件之下難以舉行這樣一個會議之外，沒有再提出特別理由，說明為什麼要一再延期。

這一延期，是國民黨不願放棄它的專政，並且顯露出它政治上的反對派的政策的一個令人驚心的表示。另外一些人都希望這一延期，其意思是估計到戰時變動大會的代表可能有一個改動。

一九四〇年以後，關於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也沒有提起過了。在沒有任何相反的证据的時候，因此不能不假定在抗戰結束以後一年以內決定召開的代表人民的國民大會的組織和會員，仍會受原來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公佈的以及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修改的那兩條法規的限制。

根據這兩條法規，制憲國民大會有一、六八一一個代表，六六五個是各區域在當地國民黨部監督之下選舉出來的，三八〇個由各職業和各同業團體選舉出來的，二四〇個由國民政府指定，一五五個由特別方式選舉出來的。

最後這一項，包括滿洲和熱河四十五人，蒙古二十四人，西藏十六人，華僑四十人，國海客軍團軍事教育機關三十人。

此外，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及候補委員二四一人為當然代表。

熱烈的爭論

這些條款。之實是中國熱烈爭論的題目。許多中國人反對指定代表和當然代表的規定，認為這是違反民主原則，並且會給國民黨以凌駕一切的權力。他們以為國民黨的官吏應該和其他人站在同等地位上來競選。國民大會裏的議席，並且應該不許國民政府指定代表。

另外，特別批評到的幾點，是沒有勞動代表或者說沒有從戰爭當中成立起來的許多工會和職業團體中選出代表來。然而非國民黨的領袖們，反對大會代表選舉的特定條例，不如反對它是一個戰前的條約不能代表今天中國政治力量這一事實那樣強烈。

依他們的見解，一個完全新的制憲的國民大會，應該在全國基礎上選舉出來，各黨派各團體都自由選舉代表。這一事實，也是支持這一論點的另一理由，即許多戰前舉出的代表，有的死了，有的被殺了，有的投降敵人去了。

憲法草案

截止目前為止，一直看不出有一點跡象足以說明國民黨願意注意這類批評，或者說在意許多中國領袖們所提出的理由：即召開制憲的國民大會，對於加強作戰努力，以及解決國內政治矛盾都有必要，因此不應當延緩到戰後。許許多多國外的均有同樣的見解的中國的朋友，不能不表示遺憾。

但是，即使我們認為制憲的國民大會的延期是對的，我們仍然必須考慮形成討論基礎的憲草的條文，這是特別需要的，即為許多美國人或者會被中國外長安子文博士的聲明說中國的憲政將採用美國形式而談論了。

宋博士作的比較，是根據這一事實出發的：即憲草規定選出定額的總統和國會以及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各院的分立。

實際上，憲草所規定的人民直接控制政府的權利，遠沒有美國憲法所保證的那麼多。

中華民國的總統，是有着極大的權力的，地位在中央政府行政、立法、司法、考試和監察院以上。只是直接對三年一次的國會負責。

總統任期爲六年，聯選得續任。他既是全國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有權宣戰，媾和，簽訂條約，任用和撤銷文武官員，宣佈戒嚴，徵收及採取「必要上」處置，但應於發佈命令三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這些權力都加上「以法律定之」。

憲章第四十四條，國家遇有緊急事變或國家經濟上有重大變故須爲急速處分時，總統得經行政會議之議決，發佈緊急命令，爲必要之處置，但應於發佈命令三個月內交立法院追認。

限制

憲章第二章，特別保證「長串的人民的自由與權利，但不像美國的民權法令，它每句都加上『非法律不得限制之』」。

因爲法律的定義，是「爲立法院所通過，並且爲總統所宣佈的律令」。這一權能的賦予，使得很多中國人都惶惶不安。他們都覺得，這種形式只會把取消人民權利的嚴重問題，賦權總統和行政院隨意處置而已。

他們對於這一更廣泛的條例：「凡限制人民自由或權利之法律以保障國家安全，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爲限」，是不滿意的。

然而這個中國憲章和美國制度的基本差別，就在於國民大會的權限問題上。

國民大會的代表，將以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出，任期是六年，國民大會將有修制法律，複決法律，修改憲法，選舉和罷免中華民國的總統和副總統以及行政院和監察院院長和各院長。

然而，國民大會由總統召開。三年一次，會期一月，雖說經五分之一以上代表同意，或者由總統召集，可開臨時會議。

因爲禁止開臨時會議，國民大會的代表，在任期當中，只有兩個機會行使政權。在兩次會期的中間時期，人民沒有權力控制政府。

憲法草案的這一特徵，一直被許多非國民黨領袖們所尖銳的批評過，認為是不民主，而且是爲總統的真正的獨裁開頭。他們以爲國民大會應具有極大的權力，並且如果它要執行真正的控制權力的話，應該多開會，不能三年只開一次。

另一個被批評的目標，是憲草所規定的地方政府的制度問題。依照憲法草案，省政府僅有的義務，就是執行中央政府的法律和命令，和監督地方政府。省政府的人，不由人民選舉，而由中央政府所任命，所罷免。

這些法規，是與集中政權於中央政府的這一種流行的傾向相並而行的。可是很多中國人都相信，由於中國各個地區的條件有着絕大的差別，這一集權只會阻礙而不會鼓勵這個國家戰後的全面的發展的。

人民對於憲章法規的不滿意和冀望有了更大的對於政府的控制權力，在一九四〇年四月舉行的第五次國民參政會中得到證實。

在這次會議當中，蔣委員長所指定的憲政期成會，提出了一個憲法修正草案，這個會中的人們，紛紛爭論，說這個國民大會不僅在兩次大會之間的三年當中無力控制政府，而且因爲國民大會能代表或許會超過二千，它一定會變成一個龐大的組織的。

因此他們提議，組織一個包括百五十到二百個代表的政治會議，從國民大會中選舉出來，並使國民大會主持，選舉出是作爲國民大會和政府之間的居間機關。政治會議六個月開會一次，代表國民大會行使選舉、罷免官吏的權力，創制、複決法律和有關於政體的立法，以及接受或者否決立法院所通過的財政和其他法案的權力。政治會議並有權通過對於行政院信任或不信任案。但是國民參政會內部的意見很不一致，所以這個修正憲草也從沒有提出來表決過。

自治政府

毫無疑問，中國憲政問題是很複雜，很困難的，很可能的會引起不斷的爭論和辯論的。反對立即

獨大民主權的人，據解說，大多數中國人都熟知，沒有想能外就現代政治和經濟、行政上的關係，他們以為開始新的政治制度，只會招致混亂與不和諧，這種混亂與不和諧，一定會損害作戰努力的，所以應該延遲到中國更團結、人民更有教育之後才實行。

另一方面，主張立即實行憲政改革的人，堅持着說，一個更民主的政府制度，為動員全國人民盡力作戰所必需。並且堅持着說，中國人民已經證實他們已經完全願意實現一個負責任的自治政府，他們抗辯一個一黨專政的政府不得不運用強烈鎮壓手段來維持政權的這一事實，是中國人民願意而且熱心要實行民主的一種證據。

從上述的觀察看來，我們不可避免的得出結論，雖說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當中好像包含着中國向着民主政府的進步，其前進並沒有超過過去四年，而事實上却已經從一九三八年的高峰後退了。

所以小黨派和無黨無派的自由主義者，對於目前情況的大為不滿是不足為怪的。尤其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暴風雨，表明了當局在戰後產生立憲政府的保證，並不是包含解決中國當前政治危機的任何一點的努力。

中共的七個參政員，只有一個出席國民參政會，充分的表明內部的政治情形仍然是帶危險的變化的。

國共關係

蔣委員長在十一中全會末次會議的演說中，關於共產黨問題的申明裏宣稱：「此為一個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但是他却繼續控訴中共：「武力割據各地，襲擊國軍，並未實踐二十六年基國難之宣言。」

蔣委員長沒有接受中共和其他黨派的立即保證小黨派合法權利的要求，只是說：「共產黨果能與政府實行相符，則中央可視其尚有勳忠抗戰之誠意，自當重加愛護。」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國民參政會隨後也通過一個決議，斥責共產黨：「應即抗戰之進行，遵守國家之法令。」

蔣委員長對國共合作的論述

國民參政會討論的問題，雖然還沒有全文的報告公佈出來，但是從上面簡短的引用語句裏，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是緊張到千鈞一髮的程度了，並且國民黨決心要使雙方論相信造成目前危機完全是共產黨的過錯。

會議於篇幅，不能敘述二十六年以來國共關係的詳情，可是某些要點，却值得着重的提出：首先應是在抗日戰爭中合作的諒解，從來沒有具體表現在一個雙方都正式接受的文件中，其結果對於兩黨合作的權利和義務的解釋，時常不同，因此開成了紛紛萬端的爭論。

一方面，共產黨解釋「統一戰綫」的協定是平等的在抗戰和建國的共同使命上的合作。

另一方面，國民黨領袖們否認這個協定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商洽好的，硬說「統一戰綫」不過是蔣委員長對中央政府的權威而已，因此他們反對共產黨保持任何程度的獨立權能。

實際上共產黨在協定下的確保留相當獨立權能，除非國民黨承認他們為中國的，一個可以行使職權的合法的多數黨派，他們是不願放棄的。

發表的宣言

關於蔣介石所提及的共產黨的謬言，那就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共產黨所發表的宣言中所提到的七點，蔣委員長在九月二十三日對此發表正式宣言加以承認。

從二十六年二月開始，兩黨領袖之間的長期磋商，以這些宣言為其最高點，兩個宣言都確定了「為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義的民族鬥爭的必要」。

但是，共產黨的宣言，號召由選舉產生的國民大會所草擬和公佈的憲法，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民主政府，呼籲採用最低限度的改進人民生活標準的綱領，和立即實現全部的民權，蔣委員長的宣言中並沒有提到共產黨宣言裏面所有的幾點，雖說它歡迎後者的取消（暴動政策和共產主義的宣傳）。

事實就是共產黨要求中蘇的領土權。包含國民黨在交涉中沒有接受的要求。但在那時要求，共產黨被認為是建立真正的民族統一戰綫所必需的，而且他們希望能够在戰爭中達到這些要求。

結論

然而，一九三七年宣言當中，值得注意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正式的批准了在八月中所已進行的討論，即是改組中國蘇維埃共和國為「陝甘邊區政府」，而國民政府政治當局正式承認了那個區域，改組紅軍為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其指揮人員照舊，但是承認蔣委員長下的軍事委員會有最高權力。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蔣容許爲邊區事實上政治上的管理者，並且保留任命領導軍隊的軍官權力。

在邊區軍隊的將領，都經蔣委員長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加以任命，朱德將軍和彭德懷將軍分別任爲十八集團軍正副總司令。

因此，共產黨有理由堅稱它已經實踐了它解散蘇維埃政府和改編它的武裝部隊爲國民革命軍的諾言了。

蔣更進一步提出主張「統一戰綫」的協定，規定新邊區政府，作爲一特別行政區，應有它全部的合法地位。這個論點，有事實可以證明。一九三八年，行政院曾經通過確定邊區合法地位的決議，雖然這個決議始終沒有經官方公佈出來。

軍事上的任務

關於統一戰綫合作的條件，沒有作出任何特別的決定，不斷產生了關聯到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作戰問題的本地事件上的衝突。指定給共產黨部隊的軍事任務，就是在敵後和與敵人交錯的區域中恢

和整理失地。

但是，八路軍、新四軍從敵人手中奪回領土的勝利，使國民黨大為驚訝，它從這兩個部隊看動在不斷增加的廣大領土以內一個競爭的政治權利的後繼。更進一步，國民黨內某些份子不贊同在遊擊區內提倡的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改革。

國民黨的領袖的爭辯說，中國共產黨所保持的特殊的方勢力和武裝部隊，在民族團結上是有矛盾的，並且不能寬容。在另一方面，共產黨聲明，他們完完全全願意交出武裝部隊和特別區域，只要他們得到行使合法的小黨派的職權的保障就行了。

然而，當着沒有任何這樣保證的時候，他們却不禁相信國民黨的真正的目的是想消滅他們會成爲一個政治力量。由於許多小黨派會經企圖反對一黨專政的制度，而結果都完全被壓制下來了。命運，更證實了他們的這種見解是對的。

軍事封鎖

他們關於國民黨動機的懷疑，由於二十六年以前最活躍的反共將領之一的胡宗南將軍統率下的中央軍的繼續的軍事封鎖邊區而更加强了。

共產黨人更進一步辯稱，不是共產黨沒有履行諾言，正是國民黨沒有履行它在它的正式的宣言和綱領上的關於實現孫中山的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的許許多多的諾言。

不容懷疑，這些都是真的。在各個游擊區和邊區裏面，民主方式的政府已經實行起來，土地所有制度及稅收，已經爲着人民的利益而修正了。而在國民黨中國，公民權却不斷地被剝奪，一黨政府仍然在統治着，大地主的權力不但沒有減縮，而且還不斷在增漲中。

現在，回轉來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九月十三日會議裏所採取的行動，很清楚的，許多評論家的樂觀見解，以現在的中國的條件來看，是沒有保障的。

一紙決議，是不能在中國或者在其他國家裏面建立起一個民主制政府的，民主不能用法令來變

致的。除非人民能够參加到建立民主的程序當中來，也不可能變成現實。

不可逃避的事實，就是在國民黨熱的中國裏面，人民參加政府的管理，一天一天地在削弱，而不是正在增加。這一傾向要是不轉變過來，國內不和一定會增加的，而在中國建立一個真正代議的政府，將會可能一天一天地越來越遠。

紅星報評論家論中國戰局

路透社莫斯科訊：紅星報評論家哥托爾赤諾夫上校於評論中日戰爭時稱：「中國擁有許多有利的條件，但他的軍隊有重大的缺點。中國迄今尚未充分利用一切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條件，以動員全國和人民。七年戰爭中，中國軍隊沒有大大增加，國內巨大的人力後備未充分加以訓練，大部份軍隊集中在陝北邊區周圍。」哥托爾赤諾夫結語稱：「中國人民對勝利信心毫不動搖，他們必將繼續勇敢作戰。」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

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分析中國形勢

據路透社莫斯科訊：「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於分析中國形勢時稱：「鐵托元帥的軍隊爲數三十萬人，而蔣介石將軍則有三百萬人，南斯拉夫解放軍正抗擊數量幾與在華日軍數量相等的敵人，且該軍人武裝更好，且集中於狹小地區內，但是南斯拉夫解放軍獲有顯著的勝利，此等勝利較中國國民政府軍隊目前所稱道的勝利要多得多。」「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宣稱：蔣介石可以大大增強抵抗，幾乎有五十萬之衆的一個中國軍隊，未參加抗日戰爭，而被留用對付邊區。八路軍與新四軍數年來想當着戰爭的首領，而國民政府的軍隊僅使用部份兵力而已。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

英報評論中國處境嚴重

援華委員會關心通貨膨脹

蘇格蘭重要造船城格林諾克發行的「電訊」報稱：「中國處境嚴重」。該報提醒讀者：「在我們這一方面，我們必須記得，戰爭不會以在西方摧毀納粹而結束，在東方有鉅大任務是軍事着我們。日本將乘目前我們集中力量於歐洲時，竭力使這一任務困難。」該報指出：中國在河南、湖在等待南失敗及面對着政治與經濟的困難。該報於述及通貨膨脹及關於中國政治中「法西斯傾向」的斷言時說：「這並不是愉快的事情，因為中國政府垮台，將在東方予我們以可怕的任務。」又援華委員會克利格對於最近發表於曼徹斯特導報上的「關於中國驚人的通貨膨脹」一文，表示同意，並稱：「中國的通貨膨脹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而英國報紙對此間很少注意。」他贊成中國國立西南聯大伍教授所提出的辦法，如紐約時報重慶訪員五月二十二日所報導者。克利格指出：這些現實的建議，包括停止發行新鈔票，限制銀行中提款，實行向政府強迫借貸制度，由特定富人強迫貸款政府五十萬萬法幣，實行徵收奢侈品稅百分之五。據克利格稱：伍教授在報告中，痛陳中國的危險形勢，因為抗戰中，事實上富人未負起中國戰費中所應負的負擔，因為他們雖然負擔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二十，但他們付出者不超過百分之三。克利格又支持大公報對此事實「失誠切切」，即過去二年中，在中日戰爭後幾年在內地設立的許多小型鋼鐵工廠，由於重大的困難，已被迫倒閉或實行投機。他說：通貨膨脹對工業的一個嚴重結果，是製造消費品的公司所獲得的利潤，較諸生產鋼鐵及軍用品者要大得多。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

6200

7

573

272506

新華日報出版
定價八元